

论艾森斯塔特阐释多元现代性的逻辑

饶义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艾森斯塔特通过对自马克思及韦伯以来的社会进化理论的质疑和批判, 对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历史的反思, 采用比较历史(文明比较)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现代性从起源、传播到成型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发展方向, 揭示了现代性沿着多样性特征展开的逻辑。他认为理解当代世界最好的方法是将其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解释、选择、重释、构建和重构的一个过程。理解现代性多样性的特征对于认识当今世界及其发展方向、认识具体社会的特殊现实,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S·N·艾森斯塔特; 多元现代性; 逻辑

中图分类号: D73//77.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4-0473-06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 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1}詹姆斯·D·费边从韦伯论述现代性的概念中推导出, “各种各样的现代性, 不管它们可能还包括什么内容, 都是对相同的生存问题的回应, ……都是对该问题尚未触动方面的回应。”^{[2](113-115)}艾森斯塔特一生的努力正在于揭露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的“黑箱之谜”, 认识费边所言的“人类生存问题尚未触动的方面”。他基于对既有社会进化理论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性历史的再认, 提出“多元现代性”的概念, 并指出, “多元现代性观念假定理解当今世界最好的方法——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是将其视为文化方案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3]

S·N·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 1923~)是以色列籍国际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以丰硕的成果、独到的见地, 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Eliezer Ben-Rafael 概述了艾氏一生研究的主线是社会变迁——从轴心文明到帝国再到现代的人类文明转型^{[4](Ⅷ-XIV)}。如果较为详细地划分, 我们认为他的学术关怀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比较社会动力、现代化和多元现代性。其思想理论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现代性的普遍性与各个社会具体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相结合, 从二者的互动过程中来解析具有多样性特征的现代文明的历史、现

状及发展趋势。早期现代性在西欧成型、在超越欧洲的传播、多元现代性的成型是艾氏阐述多元现代性的宏观视角, 对不同文明进行历时与共时的比较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因其多元现代性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国家建设、制度建构等具有极强的亲和性, 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也正是力图追溯艾氏解开“黑箱之谜”的思路, 把握艾氏阐释多元现代性的逻辑, 从而认识当代世界多样性的特征。

一、问题意识: 艾森斯塔特对现代性理论的关切

当代世界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以及激发了人类追求现代性的热望, 并且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之内几乎把所有的国家都卷入现代化网络之中。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的传播、现代化、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的后果、后现代性等已成为这一长时段多学科关注的主题。各种理论和思想纷至沓来, 从早期社会进化理论到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 从趋同论到20世纪末出现的“文明的冲突”论和“历史的终结”论, 无一不涵盖在现代性这一主题之内。艾森斯塔特考察了这些理论或思想存在的合理成分, 但他更关注这些理论的偏差及其对实践指导

收稿日期: 2008-04-29

作者简介: 饶义军(1967~), 男, 土家族, 湖北巴东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 贵州民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理论。

上的失败。于是,艾氏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质疑与批判。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疑

艾氏基本认同马克思在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理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强大趋势,也认同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具有必然性的观点,但是,他质疑马克思关于社会进化理论中的趋同成分。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认识到社会进化过程中文明之间互动所带来的多样性结构和制度动态^{[5](1)}。

(二) 对韦伯理论的质疑

艾氏认为,韦伯从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亲合性中揭示了欧洲社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唯一性,这也是他的主要贡献之一。但韦伯在把基督新教与世界其他宗教进行比较时,把欧洲社会作为文明进化潜势的顶峰,并且缩小了基督新教以外其他文明的内在动力,反而强调了其他文明非动力的成分,这样就隐含着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最终要走“西化”的道路^{[6](2)}。

(三) 对工业社会趋同论的质疑

二战后,现代化和发展的第一批研究以及许多后来延续这一脉的研究,通过现代性、发展或现代化的各种不同指数来评估被研究的社会,试图决定所研究社会接近工业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模式,或者是根据这些指数来确定是什么阻碍了它们的进程。在艾氏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研究中已经不断认识到转型社会的多样性,但是有些研究者仍然顽固地坚持在现代性的终结阶段,那些被研究的社会与早期工业社会会走向趋同,而多样性不久就会消失^{[6](3)}。

(四) 对“历史的终结”论的质疑

自东欧共产主义政治和经济发生巨变以后,艾氏发现趋同思想获得了新趋向。在极具黑格尔意味的分析中,弗兰西斯·福山通过引入“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的方式为这一趋同过程赋予了新名字。依据福山的观点,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演变对所有社会施加同样的影响,从今以后,所有的国家最终变得彼此相似。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合适选择,国家将会走同样的道路。与其他因素相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速度将进一步成为引发趋同论分析潮流的唯一因素,这种新的潮流是:当民族国家边界和它的政治能力被超越时,任何事物都可能变得相似^{[7](410)}。

(五) 对结构-功能主义某些命题的质疑

艾氏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现代化理论,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某些假设——哪怕只是含蓄的假设是不充分的,比如,社会变

迁必然导致分化;越分化的社会其现代化速度越快;越分化的社会越能制度化;经济越发展必然导致政治发展。

(六) 对“文明的冲突”论的质疑

20世纪末,赛缪尔·P·亨廷顿阐述了有关现代方案枯竭或从现代方案撤退的观点——“文明的冲突”观。按照这种观点,亨廷顿将现代化化身的西方文明图景理解为经常与其他文明处于一种敌对关系的对抗,特别是与穆斯林对抗,一定程度上也与所谓儒教对抗。艾氏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不同文明互动中冲突的一面,而忽视了文明间持续互动带来的连续解释与重释过程^{[7](4-10)}。

与上述各种理论或思想中所体现的“西化”、“趋同”、“终结”、“冲突”的观点相反,艾氏强调现代性确实扩张到了整个世界,虽然存在趋同的成分(比如在教育、经济等领域),但是世界不可能被同质化。正是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激发了他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兴趣。他把西方最初的独特文化方案作为考察西方早期现代性的起点,把西方早期现代性作为论证当今世界多元现代性的起点,从现代性的形成、传播和回应中去认识当代世界的本质特征。

二、现代性:起源与精神

现代性的起源及其精神既是艾森斯塔特认识现代性的逻辑前提,也构成了他解释纷繁复杂现代性的工具。他继承了韦伯关于世界理性化思想,认为西方“祛魅”(Entzauberung)带来了西方独特的文化前提。宇宙由神意注定的合法性的衰落、宇宙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人类开始“祛魅”,相伴而来的是人类强大力量的不断彰显以及对人类社会秩序安排的各种构想及相互斗争,这时才有现代性的出现^{[2](113-115)}。这种独特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引生了新的政治方案和新的集体认同模式,共同型构了早期现代性产生的内在动力,于是在17世纪的西欧便形成了独具现代精神的现代文明雏形。

(一) 早期现代性产生的内在动力

1. 独特的文化前提

现代规划最初在西方出现时内含着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它们尤其突出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反思精神和探索精神。其一,表现出人的能动性(agency)、自主性和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的观念发生某些转换;其二,表现在未来观念上——可以凭借

自主的人的能动性或者凭借历史的步伐得以实现各种各样图景的可能性是开放的；其三，表现在反思精神上，对人类前存的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法化性的质疑，进而反思政治权威、权力结构和性质，这种反思意识不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流行的超越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的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上，而且发展到质疑这类图景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模式的给定性；其四，表现在探索精神上，即产生了社会可以通过人类的自觉活动而积极加以塑造的信念。上述概念的结合产生了塑造社会的最佳途径的两种信念：一种是有可能弥合超越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裂隙，有可能通过世俗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实现某种乌托邦与末世论的图景。另一种是，越来越多的接受多元个体和群体的目标与利益的合法性，以及有关公益的多元阐释的合法性^{[7](10-11)}。这种独特的文化前提进而反映在政治方案和集体建构上。

2. 独特的政治方案

现代方案带来了政治秩序概念、前提、政治领域的构造以及政治进程的特征的一些根本转变。这些转变像一个因果链一样展现出来：首先，在政治领域最明显的表现是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性的崩溃，接着是构建政治秩序的不同可能性方案相继出台，相继而来的是有关人类角色如何构建政治秩序的争论的展开。于是，有关政治领域各种各样的构建取向——极权的取向与多元的取向常常与反叛的取向和知识分子唯信仰论的取向相结合，与强烈中心形态与制度重构的取向相结合，从而引生了政治进程中各种新形式的社会运动和抗议运动，它们带来了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的一些独特特征：强调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的公开性；强调统治者的责任观念；强调社会的边缘和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潜在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中心渗透边缘、边缘冲击中心的强大趋势；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奇里斯玛化与抗议主题和象征(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相结合^{[5](11-12)}。抗议的主题和象征构成了人类解放现代规划的重要成分，它们整合到中心的强烈要求，已大大超越了帝国时期中心与边缘关系，构成现代政治领域的独特景观。

3. 独特的集体与集体认同

现代方案也打破了前存的集体和集体认同模式，逐渐要求以新的标准和方式重构集体，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以及使其制度化的方式出现了新的特点：出现了重新建构集体的强大趋势；越来越强调市民成分；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的建构高度结合；各种特殊成分与更广泛的、潜在的普遍成分之间产生了持续紧张；

集体建构不断地被问题化。这些新现象的出现导致了集体认同的标准的给定性受到了质疑，以自我构想的成分占据主导地位，即认同标准从强制性建构转向了自主性建构。所以，认同标准经常构成了论争和斗争的焦点，并以高度意识形态的术语表达出来。根据新的集体认同标准，社会中“自我”与“他者”界限明确^{[7](12)}。

(二) 早期现代性的内在精神

艾氏认为，欧洲现代性的核心逻辑前提就是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与参与能够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秩序。即，一方面强调释放人类自主性与能动性的活力，另一方面强调人类对各种制度领域自主改造、对各种秩序构建能力的信仰。它超越了任何古老轴心文明，其超越性来源于上述独特的文化、政治方案以及集体认同模式，明确表现在各种取向的抗拒运动总是与中心及其制度建构倾向相结合。概括起来，欧洲早期现代性的独有特征最初集中表现在，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效率经济、市民社会、“理性”扩张得到完全表达的民族国家，以及基于自由创造一种社会政治秩序^{6}。这种早期文明的独特特征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现代精神，即公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不断增长的关于平等、自由的诉求，在中心不断增多的参与诉求，关于自主塑造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诉求。正因为蕴含着这些独特的精神，促成了欧洲早期现代性的成型。

自17世纪始，早期现代性便携带着其精神特质开始了传播的历程。也正是各种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传播历程的回溯或展望，才产生了上述有关的“西化”、“趋同”、“终结”、“冲突”的理论或观点，而艾氏则眼光独到，他把现代性的传播史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文化方案不断受到解释、选择、重释、斗争和重构的故事。

三、现代性传播及回应：不断解释、选择、重释、斗争、重构的过程

现代性文明在欧洲成型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扩张、移民以及全球化而在世界传播。进一步，艾氏所要论证的是世界为什么没有被同质化，亦即为何表现出多元的特征。他认为，现代性传播的实质是西欧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遭遇所荡起的回应，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持续互动——一个对西欧文明和“本土”文明不断解释、选择、重释、斗争、定型的动态过程。

(一) 文明的遭遇——对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吸收与排拒

亨廷顿曾总结过现代性传播过程中非西方社会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吸收与排拒,他认为,“在开始,西化与现代化是紧连在一起的,非西方社会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逐步走上现代化。但现代化步伐增大后,西化的比重减少了,而本土文化再度复苏。进一步的现代化则改变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权利的平衡,并且增强了对本土文化的承诺。”^{[9](75-76)}国内学者也做过形象的描述,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受冲击社会或文明持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10](27-35)}。

西方现代方案在传播过程中不可能被非西方社会照单全收是艾氏始终的坚持。西欧早期现代性是其内在潜质的发扬光大以及通过各种群体互动而成型的,所以在西欧早期现代性的传播过程中,其逻辑前提已经对那些必须做出回应的社会构成了挑战。现代性传播开启了把既不具备现代文明的象征前提也不具备现代文明特定制度轮廓的社会整合进新体系的过程,即开启了一个冲击与回应的过程。他认为西欧文明冲击到其他文明时,必然会瓦解这些社会的象征与制度的逻辑前提,将各种新的选择机会展现在这些社会的各种群体面前,并在这些社会形成意义深远的变迁过程、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新的符号和制度的定型化过程^{[8](367)}。这个定型化过程决定于不同的解释、选择、重释、重构的结果,而解释到重构的质量又受制于文明遭遇时的一些特定因素:

第一,受制于文明或文化逻辑前提。不同社会或文明关于宇宙和社会秩序之间基本看法的差异,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构建取向。

第二,受制于回应变迁传统。在大多数文明中,特别是在所谓的“伟大的文明”(或轴心时代的文明)中,都形成了回应外部冲击、内部变迁的传统,这些传统会直接影响到回应方式及能力。

第三,受制于精英结构和取向。精英携带着各种取向,他们的历史经验、理想,他们动员资源的能力,他们之间的不同结盟,以及他们与新的、不同的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外部”力量的结盟,必然会影响到中心制度框架构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控制。不同的精英结构和取向,直接影响吸收和排拒外来文化的程度。

第四,受制于进入新的国际体系的“切入点”(point of entry)。切入点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回

应方式,影响到现代化的时序,从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建构。切入点可能是经济的、政治的、也可能是文化的、军事的。如,中国与西方现代性遭遇的切入点是军事;拉美许多国家的切入点可能表现在殖民化和移民方面。切入点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与拉美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第五,受制于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化过程可能始于部族集团、城邦社会以及各种类型的农民社会,也就是始于发展程度和类型各不相同的社会”。^{[11](25)}起点上的差异极大地影响着不同社会现代化的动力状况、进一步的分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极大的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遭遇的问题。

正是上述西方与非西方之间、非西方内部之间的差异,带来了对现代性的象征观念和逻辑前提的不同解释,对现代性基本象征和逻辑前提的不同选择和重释,对新的象征和集体认同的不同接受程度,以及对一般的现代性,特别是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或消极看法。所以,艾氏认为,“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是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却迥异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动态。”^{[7](22)}也就是说随着西欧现代性的扩张,非西方社会不可能被西化或同质化——即使面对同样的冲击但却会产生迥异的回应方式,形成不同的秩序和制度格局,从而使各种文明或社会表现出多元的特征。

(二) 现代性的持续转变

在艾氏看来,现代性具有持续变化的特性,它不仅表现在具体文明或社会,而且在国际领域打下烙印。

1. 持续互动在具体社会内部带来的新现象

现代性的传播,使非西方社会采用了领土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基本模型,也采用了诸如代议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等现代制度模式,但正是西方现代规划前提与“本土”的各种象征前提的持续互动,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西方现代规划在全世界的传播,削弱了其他社会的文化前提和制度核心,这些社会中的精英与知识分子参与到新的现代普遍的传统中来,一方面对西方主题和制度进行挪用,有选择地整合到自己的新的集体认同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传统的特殊主义成分,表现出了现代性的特有修正潜能,二者的内在紧张引起了具体社会内部长期存在

的边缘冲击中心、中心渗透边缘的现象，并且常常伴有新的国际压力，这样，国际与国内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往往互相重叠，同时作用于国家的中心制度框架，致使社会中心制度表现出脆弱性与易变性的特征，从而导致政体或政权更迭。因此，艾氏认为，“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12](49)}

2. 持续互动在国际上带来的新现象

非西方社会最初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特定主题和制度模式的挪用，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政治方案以及新的集体认同的出现，先前民族国家内部的许多问题逐渐获得国际化的性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象征的中心地位，作为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和集体认同的主要成分的克里斯玛焦点的地位逐渐减弱；新的政治、社会和文明图景，新的集体认同的图景正在产生，并伴随现代中心的转变越显复杂。这些新奇的图景以种种新的社会运动为载体传播开来，对古典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及现代方案发出了挑战，到目前为止已经占领了未受到挑战的政治、文化中心。20世纪陆续出现的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学生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排他主义的“种族”运动、国外散居者群体寻求归属的运动、恐怖主义，都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范围，它们都已打破“被压制的”认同、以高度重建的方式进入到社会政治中心，进入到国际领域，它们既具有进步的趋向，也显示了破坏的潜能。它们与旧的同质方案的霸权分庭抗礼，在中心制度领域——教育方案、公共通讯、媒体输出中要求他们自己的自主地位，并且在设法重新定义公民身份和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的意义的诉求上，他们越来越成功。尽管如此，这些运动虽然超出民族-国家模型，但却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所以，艾氏认为“当代舞台的特征，是以下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现代性的不断重释日益多样化，一方面是多元的全球趋势和相互参照点的发展”^{[7](34)}。

基于以上论述，艾氏阐释了现代社会异质的、可变的、易变的多元特性，修正了前述理论的某些成分。他第一次将多元现代性的含义完整地概括为：“第一种含义是，现代性和西方化不是一回事；西方模式或现代性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第二种含义是，这类多元现代性的成形，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冲突上留下烙印，……而且在不同的纵贯全国的(cross-state)

和跨国领域打下烙印。……最后一层含义是认识到这类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7](412)}

四、批判与思考

艾氏从西方特有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出发，阐释了早期现代性的起源；从西方早期现代文化、政治方案以及集体认同中阐释了以“理性”文化、效率经济、市民社会、民族国家以及基于自由的社会政治秩序为核心的现代性特征；从现代性传播给非西方社会带来的选择、重释、斗争与定型化中，阐释了现代性的可变性特征；从西方文化前提与“本土”文化前提的互动以及现代性在国际上的新表现，阐释了现代性易变性的特征，从而完整地展现了多元现代性形成的逻辑。但是，他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论也受到了各种批判，如马丁·布鲁姆指出艾氏论述路径上存在缺陷，他认为经济和技术是促成现代性的两个主要方面，而艾氏却主要从文化遭遇上去论述，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可理解的^{[13](674-675)}。M·H·麦金仑认为艾氏理论前提存在缺陷。他认为艾氏在论述西方文化前提时继承了韦伯的理性化思想，但忽视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思想对现代性成型所起的作用，只是强调了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扩大对世界带来的影响，从而扭曲了韦伯的理论，必须进行修正^{[14](186-193)}。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艾氏关于多元现代性论述有着严密的逻辑，其价值远大于瑕疵。艾氏关于多元现代性逻辑的阐释，为我们认识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拓展了空间；对于非西方国家坚持根据世情、国情和民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对于国家建设、制度建构——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更具有指导意义。一方面，他认为“在政治领域，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疆域的日益扩展，尤其是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之强化。其次，它还表现为潜在的权力不断向更广泛的群体内扩展，直至它最终落入所有的成年公民之手，从而使社会形成一个和谐的道德秩序”^{[12](4)}；另一方面，还指出，“构建一个强大的、开放的、有弹性的中心制度框架，引导大众广泛、和谐同、有序的参与，才能容纳和化解普遍参与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①这是现代性向民族-国家发起的挑战。他的这些思想或理论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民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强的亲和性，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注释:

- ① 此为作者 2007 年 10 月 28 日与艾森斯塔特关于政治发展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2] James D.Faubian, Modern Greek Lessons. A Primer in Historical Constructivism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S·N·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J].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2000, 129(1): 1-29.
- [4] Ben-Rafael, Yitzhak Sternberg. Comparing modernities: Pluralism versus homogeneity [C]// Essays in homage to Shmuel N. Eisenstadt.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 [5] S·N·Eisenstadt.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M].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S·N·Eisenstadt. Patterns of Modernity (Volume II) [M].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87.
- [7] 艾森斯塔特. 反思现代性[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 [8] 艾森斯塔特. 历史传统, 现代化与发展 [C]// 谢立中, 孙立平. 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9] S·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 [10] 李世涛. 现代性的多元之维——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及其对中国的启发[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 27-35.
- [11] S·N·Eisenstadt. Soc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2] 艾森斯塔特. 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13] Martin Bloom. Reviewed Work(s): Patterns of Modernity·Vol.1: The West. By S.N.Eisenstadt. Patterns of Modernity·Vol.2: Beyond the West. by S.N.Eisenstadt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8, 64(4): 674-675.
- [14] Malcolm H MacKinno, Weber Western Christianity, Wirtschaftsethik. A corrective to Eisenstadt [J].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Cahier Canadien de Sociologie, 1990, 15(2): 186-193.

Research on the logic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explained by Eisenstadt

RAO Yiju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N.Eisenstadt exposed the logic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through questioning and criticizing social evolution theories after Marx's and Weber's, rethinking complex modern history, making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to observe dynamical process and developing orientation of modernities from origin and the spreading to ultimate shaping. He believed that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as to view it as a story of continual constitution and reconstitution of a multiplicity of cultural programs.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the world and its developing direction, and to recognize special actuality of various societies as well.

Key Words: S.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logic

[编辑: 颜关明]